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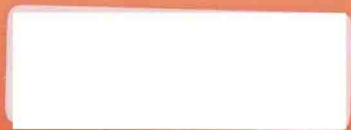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SHANDONG GEMING
DOUZHENG HUIYILU CONGSHU

历下火种
光岳春秋
微湖情
淄流滔滔
徂徕烽火
忆沂蒙
胶东风云录
战斗在渤海平原上
鲁北烽火
烽火鲁西南

光岳春秋(下)

本书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SHANDONG GEMING
DOUZHENG HUIYILU CONGSHU

光岳春秋(下)

本书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目录

CONTENTS

扑不灭的火焰

——中共第二届鲁西县委的建立 袁寿宸 | 001

早期革命五烈士 王筱湖 | 005

野火烧不尽

——鲁西平原革命斗争片断 申云浦 | 016

鲁西党组织活动片断 姚仲明 | 028

冠县党的早期建设 王维群 | 034

中共临清特支成立前后 李葵元 | 041

鲁西北抗日斗争片断 张承先 | 047

四十二人守聊城 于笑虹 | 060

开展政治工作,发动群众抗战

——山东省第六区政治部工作片断 许 法 | 071

在特委机关工作的回忆 张祥甫 | 077

鲁西北的革命熔炉

——聊城政治干部学校 周子明 许 法 | 082

回忆聊城政治干部学校 任仲夷 | 087

忆《抗战日报》 翟向东 | 090

我在《抗战日报》 鲁西良 | 096

忆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 刘定一 | 111

抗战初期鲁西北妇女工作片断 李 虹 林 楠 | 119



鲁西北的一支抗日“娃娃兵”

——忆青年抗日挺进大队	阎戎	124
国民党是怎样破坏鲁西北根据地的	徐运北	132
寿张县抗日政权的创建及其被扼杀经过	孙思白	137
为真理战斗,为祖国献身		
——忆张郁光烈士	张纪光	145
从鲁西第三十一支队到八路军平原纵队	白桦	150
杨勇同志在冀鲁豫	段君毅 赵健民 徐运北 张承先	156
琉璃寺战斗	许法	159
冠县抗日根据地初创前后	许梦侠	165
聊南的抗日斗争	王鲁光 谭启明	172
临清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胡代耕 史烈光	180
清平县党的建立与发展	赵振清	186
朝城县党组织的建立	王史可	193
冠县早期的妇女活动	洪林	197
冠、莘、朝回族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	丹彤	202
我参加的几次战斗回忆	燕翼	209
日寇占领冠县城后的斗争	王志浩 马景汉	214
在聊堂边战斗的一年	张炬 刘喆	222
高唐一带艰苦曲折的抗日斗争	解金声	229
朝南一带的对敌斗争	陈东明	238
反扫荡斗争中的朝北粮站	梁毅民	244
在平敌占区党的工作	梁久让	251
冠堂公路上的对敌斗争	王西原	255
冠北工作队发动群众的斗争	杨易辰	259
冠堂地区特大灾荒到来之后	于龙 张鉴古 申象震	267
聊堂工作团活动片断	赵国璧	274
抗战时期的鲁西北青年运动 ...	郭清书 姚汝林 许世平 刘保勤 高文礼	279
儿童救国团活动片断	杨先民	285

鲁西北抗日文化教育工作片断	丹 彤	288
对冀鲁豫第四中学的回忆	杨志高	293
抗日卫东中学的战斗生活片断	林 远 胡 雷	298
活跃在博平一带的一支抗日武装	胡泮生	306
处决叛徒张星五	满登法	311
马颊河支队战斗片断	秦 光	317
太平庄战斗	张 侠	324
机智灵活打击敌人	刘墨清	330
冲出铁壁合围,保护抗日专款	姚志明	334
智擒肖冠英	齐林山	339
敌营策反	田春宵	342
孙庄抗日民兵联防	周 流	355
青年干部的优秀榜样		
——忆肖永智同志	赵健民	360
英风常留运河畔		
——忆徐翼同志	冯之琨	370
耿耿丹心为人民		
——忆张炳元同志	冯子华 王惠卿	379
想往事忆战友	杨立功	383
北杨集七烈士	沈廷梅	389
情操高洁,风范永存		
——忆孙仰周同志	刘立平 鲁西良	393
一个质朴难忘的好同志		
——忆吴新之	张 潭	398
勇于打开困难局面的人		
——忆王富海同志	贾振铎	403
他永远活在卫东人民心中		
——忆李道先同志	高以显 刘风波	409
八十二岁前清举人四处奔走呼吁抗日	贾静五	413

每当我思索我的生		
——忆晋士林团长	雁 翼	416
冠县的土地改革	司洛路	419
解放战争时期鲁西北的整党工作	张新村	433
刘邓大军渡河片断	王化云	441
阳谷县群众大参军运动点滴	李一丁	447
组织干部随军南下	姚传德	451
孙口搭浮桥,激流渡大军	谢惠玉	455

扑不灭的火焰

——中共第二届鲁西县委的建立

袁寿宸

中共鲁西县委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恶劣形势下组建的。她成立后的第四个月，即一九二八年二月，就组织领导了震动整个华北的坡里暴动，坡里暴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党的影响深入人心，在鲁西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坡里暴动后，中共山东省委将县委书记张干民同志调走，由赵以政同志代理县委书记（不久被捕牺牲）。一九二八年五月，在凤凰集重新组建了中共鲁西县委（我们把这届县委称为中共第二届鲁西县委），由贫农出身的林梦白同志任县委书记，我任组织委员，郭庆江任宣传委员，袁平之、孙大安和宋占一为县委委员。由于形势的需要，县委的工作从以聊城为中心转移到以博平为中心。在一次县委会上，决定郭庆江去省委汇报请示工作，派我到莘县、阳谷、聊城等县找党员取得联系。由于当时地主豪绅、军阀、官府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环境很恶劣，我没有找到人。回来后向县委作了汇报。郭庆江去济南后，一直没有音讯。新县委成立后，缺乏经验，开展工作有困难，县委决定再派我去济南找省委。我带着组织上交的重托，踏上了征途。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沿胶济铁路出兵济南，杀了蔡公时，制造了“五卅”惨案。整个济南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我怎样才能顺利完成重托呢？恰巧在去济南的路上，我结识了穷友李鹏飞。李是堂邑人，想去济南寻点活路。攀谈中，他告诉我，他有个仁叔住在离黄河渡口不远的潘家店。我跟他一起投宿潘家店。在那里得知：黄河渡口有个国民党的卡子，以抓嫌疑、查走私为借口搜刮民财。第二天，我们来到渡口。那些国民党兵，看我



们穿着破烂，一副穷相，榨不出油水，就横眉竖眼地把我们赶过了卡子。过了渡口，我们不敢松气，一路紧赶。因为仁叔叮嘱过我们：鬼子在济南城外围重要道口早晚都放卡子，天不黑就戒严，千万不要在戒严时间进城。天刚过午，我进了城，来到省委联络站。省委联络站设在趵突泉，以算卦摊作掩护。我扮作算卦的，用规定的暗语和联络站的一位同志接上了头，他安排我住下。第二天，省委来了两名同志找到我。为了不被人发觉，我们一前一后来城南的四里山上。我首先汇报了去各县没找到党员的情况，接着又说道：“新县委刚成立，斗争经验不足，遇到政治形势的变化，又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不知如何开展工作？”省委的同志说：“回去你们就先干着，今后的活动一定要采取秘密方式，不要公开活动，防止敌人破坏。”我又问：“郭庆江为什么没有回去？”省委的同志说：“郭庆江在省里有工作，暂时不能回去。”

我从济南回来后，将省委的指示和郭庆江没回来的原因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决定今后要和党员单线联系，秘密开展工作，就不召集党员集体开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省委派郭庆江去高唐县联系工作。他在和共产党员金谷兰同志谈话时，不幸被捕。随后将郭庆江解回原籍博平入狱。同年秋的一天，我去袁果家，进门不大会儿，突然闯进四五名警察，随即把袁果抓住。敌人大概是有目的而来，不认识我，我侥幸脱险。

我从袁果家跑出后，让人转告林梦白同志暂时隐蔽。我也离开本村，到亲戚家住了一个时期。

由于郭庆江和袁果的被捕，组织上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再加上长时间得不到上级指示，我们县委的同志们都很焦急。一九二九年三月，县委决定派我再赴济南。

我到济南后，发现联络站已被查封。那时党的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联络站被破坏，接不上关系，就无法找到省委。我只好回来，向县委汇报了这个情况。县委决定：等省委来信或来人后再说。可是等了好久，还是没有音信。大约在同年的六七月份，县委又一次派我去找省委。到济南后，省委联络站仍被封着。怎么办呢？上次没有经验，看到联络站被封就回去了，这次还能就这样回去吗？我下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省委。于是我怀着希望的心情在街上转开了，看能不能碰到省委内我认识的同志。真是巧得很，转着转着，一下看到了我上次向省委汇报时的赵同志。我当时高兴、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恨不得一下子把几个月来找不到上级组织的苦闷心情都吐出来。我竭力抑制着

自己的激动，赶紧问道：“为什么找不到你们了？”赵同志环视四周警惕地说：“省委其他同志都走了，我也要马上上火车，你不要跟着我，这样危险。”这突然的情况，使我立即感到，省委一定遭到了破坏。但我向省委请示工作的心情太急切了，还是一边跟着他走，一边请示工作。赵同志也不顾危险地边走边向我交代说：“还是和从前跟你们讲的那样，一定要注意，不要暴露组织，防止敌人破坏，回去你们先干着，等有机会，再联系。”说完就和我匆匆分手了。后来，我们又几次找省委都没有找到，县委和省委就此失掉了联系。

郭庆江和袁果的被捕，使党组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和上级失掉联系又使我们摸不清方向。今后怎么办？为了统一大家思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县委及时召开了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及省委指示的秘密原则，研究了几项具体工作：一是坚持开展隐蔽斗争，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二是对党员要单线联系；三是发展党员和农会会员一定采取慎重的方针，秘密进行。

根据县委的决定，我们先后到博平、聊城和堂邑等县，发展了谢尚庆、袁绍之、林孟河、袁本固、林孟祥和李鹏飞等十几名会员。其中谢尚庆因从小替人放羊，受剥削、压迫深，阶级觉悟提高快，就先发展为党员。再如袁绍之，他家住袁家楼，家庭贫困，对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极为不满，有一定反抗精神，是我们发展的对象。因此，我就经常接近他，用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逐渐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不久他就加入了农会。他入会后工作积极热情，成为农会中的骨干力量。经过实际考验和培养后，又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以后他担任了袁家楼村的党支部书记。

在此期间，我们还为保护群众的利益，做了些工作。一九三五年秋后，我们村的村长调到乡里去了。有人提议让我当村长。我是党员，又是县委委员，当村长是否合适？我将这一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同意我担任村长，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群众利益，团结群众，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乡政府经常向各村要一种“花费”钱，不管地多地少，是穷是富，一律均摊，穷人无不怨声载道。征得县委同意后，我召开了一个区长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按土地多少分六等摊“花费”。这办法实行后，土地少的贫雇农高兴极了，他们到处奔走相告。“这下好了，我们穷人有了为自己办事的村长了。”但实行按地多少分等不久，富户又提出恢复平均摊的办法。我向县委汇报后，县委及时决定发动群众向富户进行说理斗争，团结中农，孤立少数顽固势力，坚决维护群众已得的利益。于是我们布置党员秘密串

联发动群众。群众起来后，由党员出面带领大家和富户斗。富户看人多势重，吓得不敢再坚持平均摊派了，只好乖乖地按群众意愿实行了分等摊派。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发展到新阶段。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县委及时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党员的集体组织生活，要求党员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党员，以便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迎接抗日战争的高潮。

根据县委的决定，县委委员进行了分工。我当时除了负责袁家楼党的工作外，还负责博平城西一带的徐官屯、大何庄、大桑庄、八里庄和于庄等村的工作。平时经常到这些地方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找一些农会会员、积极分子谈话，条件成熟的就迅速发展入党。如徐官屯的刘法文，他当时是农会的联络员，负责附近十几个村的联络工作，工作非常积极，由他发展了几十名农会会员，经过多次接触后，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培养他，组织上又送他去南宫八路军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学习回来后，他思想上更成熟了，自己又先后发展了六名党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县委及时做出了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革命力量，积极开展公开的革命活动，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决定。县委重新进行了分工，并增加了力量。林梦白同志带领一人去博平城南；我与袁动等去城西；谢风和等去城北；袁平之、袁绍之和袁本固等去袁家楼一带。各地的党员同志也积极活动，开展工作。袁敦颐按染布串乡的路线，联络当地会员开展活动；林梦河和林梦海加上杨家集的原有会员，以杨家集为中心，积极向聊城和在平两县边区开展活动，首先在杨家集发展党员，成立了党支部，接着又在张庄、孟家营进行组织发展工作，并在蒋官屯等村庄吸收了一批农会会员。这样很快发展了聊、茌边区的革命力量，使党组织得到发展。党支部由过去的一个发展成为两个，党员人数也由过去的十几名发展到四十多名。同时，农会会员也有较大发展。一九三七年底在博平县城内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以袁本恒、谢风和为会长的“博平县抗日救国农民互助会”，使革命团体有了更快的发展。这些革命力量在参军参战等抗日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底，我们与鲁西北特委和博平县委联系上。至此，第二届鲁西县委胜利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以后，就在鲁西北特委和博平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新的贡献。

早期革命五烈士

王筱湖

王寅生、赵以政、杨耕心、宋占一、孙大安、张廷焕六位烈士（注），是鲁西北地区较早接受“五四”新思潮的进步青年，并在大革命时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鲁西地区党组织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他们对党的事业忠贞不已，赤心耿耿，为祖国的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六位烈士，有的是我的领导，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这些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四五十年了，时至今日，每当我回忆起他们英勇奋斗的事迹和对我的言传身教，他们的光辉形象就屹立在我的眼前，激起我深切的怀念。

王寅生烈士

王寅生同志，字宾卿，山东省阳谷县安乐镇南街人。生于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五日。早年在安乐镇县立第二高小读书，后又考入聊城省立二中。他勤奋好学，为人正派，深孚众望，到聊中不久，即被阳谷的同学推为同乡会长，他是鲁西接受“五四”新思潮较早的青年之一，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时他联络一些进步青年，钻研马列主义，组织和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有一次暑假，他回乡趁安乐镇庙会演戏之际，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要登上戏台向观众演讲，借以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这次庙会恰好是他父亲王丙煜的会首，他父亲坚持主张开锣唱戏，他就硬要停锣止戏进行演讲，致使他们父子之间闹成了僵局。结果还是他父亲



败兴走开，他登台讲演近两个小时，由此可见王寅生同志的革命精神。

一九二五年十月，王寅生同志为了响应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号召，他联络组织了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南下广东考入黄埔军校，在第四期的政治科学学习，同年冬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决定出师北伐。王寅生奉黄埔军校党组织的指示，回山东发展党的组织，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那时叫作“特别工作”。在济南他介绍了当时在山大附中高中班求学的杨耕心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此间他还到他的家乡阳谷县安乐镇一带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安乐镇一带和聊城二中学生中的党员多是他介绍的。其中包括他的表嫂朱华亭（朱一九二七年夏于武汉由党组织派赴苏联学习，是鲁西留苏的唯一女党员）。次年寅生同志返回黄埔军校，春天他又转到武汉和邓恩铭同志一道工作。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山东和华北的革命青年，群情激愤，在武昌旧省议会召开反蒋大会，到会有一千多人，王寅生同志被推选为三人主席团之一。同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已成定局。王寅生同志和邓恩铭同志对活动在武汉、江西一带的山东革命青年作了安排之后（一部分留苏，一部分随军，一部分回乡闹革命），他也秘密返回山东，继续从事革命斗争。他协同邓恩铭同志重新组建新的山东省党和组织地区党委，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九二七年十月间，王寅生同志被选为省委委员。他一面在济南工作，一面不断来往于聊城、淄川、博山和鲁南各地，组建党的各级组织。同年十月，他和张干民一起组建了中共鲁西县委（东昌县委），以阳谷、聊城、博平为基地，并在聊城的三师、二中发展了大批党员，与聊城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当时鲁西国民党的头头们也都集中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以此作为和我党争夺鲁西进行其反革命活动的阵地。在这些国民党头头中，有的还和王寅生同志同过学，当这些家伙听到了王寅生同志返回鲁西的消息之后无不为之心惊胆战。例如，和王寅生从安乐镇高小直到聊城中学都是同班同学的朱梅，自王寅生同志南下之后，从聊中转到三师读书。并在三师当上国民党的头头，而且很活跃。当王寅生同志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于当年十月某天的下午，以拜访老同学的名义，直奔三师的传达室。经工友传呼，朱梅到达传达室的门旁，从门缝里望见是王寅生找他来了，立即转身边跑边喊：“共产党来杀人了！”吓得三师国民党的头头们有的跳墙逃跑了，有的钻到寝室的床底下，致使王寅生同志未能达到“会见”这个家

伙的目的。

王寅生同志是一个举止言谈和蔼严肃、令人可亲的人，为什么当时鲁西国民党的头头们都那样地害怕他呢？一则因为这些家伙们早就了解王寅生是个铁面无私、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二则这些家伙更晓得他们的总头子蒋介石早就向共产党人开刀了。他们做贼心虚，无时不在提防着王寅生这位坚定的共产党人返回鲁西。尤其是他们都是一些为了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和共产党人正面较量，王寅生同志果然找他们较量去了，当然他们都害怕得要死了。同时也说明了王寅生同志在鲁西影响之大。如果他晚牺牲几年，定会对鲁西党的工作开展有更大的贡献。

一九二七年秋，为了发展自己的武装，建立农村根据地，王寅生同志亲自将鲁西县委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计划，交省委审批。同年十一月他以山东省委指定的代表成员身份，赴上海列席了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

一九二八年春，反动军阀张宗昌在北伐及日军要进驻济南的情况下，在济南实行特别戒严，滥杀无辜，形势十分紧张，中共山东省委机关也不得不移至北郊的一个小山村中。四月下旬的一天，王寅生同志承省委的指示，身带手枪外出执行任务，行至鲁丰纱厂的道口时，遇到张宗昌匪军的搜查，不幸被捕，以“赤匪乱党”之名被杀害。王寅生同志在赴刑场的途中大声揭露军阀的反动罪行，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反动统治者未敢把他解到刑场上，在中途就把他害死了。时年仅二十四岁。

王寅生同志是我省早期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共鲁西党组织和阳谷党组织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为山东的革命事业和鲁西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光荣业绩将永远在鲁西人民中间传颂。

杨耕心烈士

杨耕心（字一斋）同志被人称为“读书迷”。他在山大附中高中文科班读书时能背诵英文小字典。自一九二六年秋加入共产党后，他把那种读书的迷劲，变为进行革命工作的干劲了。当年的寒假，他由济南回到家乡，不久即在九都杨建立了党的支部。寒假过后，他又回到山大附中，一边读书，一边继续为党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并对他进行监视。在毕业前两个月，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学校当局开除。为了避免引起其父亲的怀

疑，他没敢立即回家，多次往返于济南和聊城，继续为党工作。待毕业时间过后，才回到家中，回到家后，他积极发展党员，并先后在九都杨和宋堤口建立了农民协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耕心同志为了配合农民暴动，写了很多“大家都要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让我随他跑遍了阳谷城北不少大村庄，暗暗地将标语贴在村外的树上。通过标语，聚集了数万扛着红缨枪的群众，将阳谷县城围困起来。后来，我也带领着我村几个青壮年，扛着红缨枪赶到了城北范家林活动了两天。群众有来有走，一直将阳谷县城围困了十多天，给阳谷的贪官污吏一个很大的打击。事后，耕心告我说，没有料想到，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鼓动，能发挥这样大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十月间，耕心同志在我们邻村发现了一股以韩建德、曹万年为首的潜伏武装，他通过亲戚关系和韩、曹进行了一次接触。他认为，这股潜伏武装，可以争取团结为我党发动坡里暴动的武装。耕心同志向中共鲁西县委汇报了我和韩、曹接触的情况后，县委几位负责同志同意他的看法，立即派聂子政同志协助耕心同志做争取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去，做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信联络助手。同时，经由耕心同志介绍，我转了党。那时，为了躲避他父亲的监视，我俩多在夜间进行活动。后因他父亲不允许在他家招待各地来的活动分子，中共鲁西县委即改在我家（梨园村）设立了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我担任联络工作。耕心家的几位长工，也是他的有力助手。此间，耕心介绍宋励华同志加入了共产党，安排他主要做会道门的工作，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暴动。

一九二八年元月十四日，即古历腊月二十二日，暴动开始，韩建德、曹万年的武装迅速占据了坡里天主教堂。之后，耕心同志又和韩建德约定，腊月三十晚上乘其不备，首先收缴九都杨庄地富的枪支。耕心预先布置好了内应，使韩建德率队顺利攻进了九都杨庄，完成了收缴全村地富枪支的任务。

原想，我们占据教堂以后，一面扩大武装，一面大力发动群众，用来巩固坡里根据地。但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做到这一步。占据坡里教堂不久，即遭到军阀张宗昌部两个旅的围困，从此内外断绝了联系。于古历正月十六日夜间，暴动武装及全部工作人员突围奔向了冠县一带。继又遭到直隶军阀褚玉璞部截击，从此暴动武装即全部溃散了。

坡里暴动失败后，耕心同志在当地已无法存身，又为其父所不容，党即派他到东北工作去了。我的身份在当时没有明显的暴露，开学后，我又回到聊中。

一九三二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以小学教员做掩护。我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起来了。耕心同志告诉我，他刚到东北时，没有公开的职务，无法存身，幸因他的英语好，考进哈尔滨邮局，担任了邮差的职务，虽然薪俸较高，生活有了保证，但受职务所限，不便接近广大群众，难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返回家乡的机会到来了。他多次给他父亲写信，陈述在东北当亡国奴的苦恼，希望允许他回家当个小学教员，终于得到了父亲的同意，返回家乡。他父亲的把兄弟焦光普正任阿城县立三高校长，当即把他安排在三高当了国语教员。这时，我刚回家，接到北平地下党员韩子栋同志的回信，不同意我去北平，要我留下在阳谷建立一个联络点，并推荐我到民众教育馆附设平民小学当教员，耕心同志和子栋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认为，鲁西的党虽然和上级党委失掉了联系，但要先为党工作起来，不能等找到了上级党的关系再去为党工作。耕心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觉得找到了耕心同志就是找到了上级党的关系，因而对耕心同志的主张由衷地拥护。按当时当地的情况，他提出，必须抓以下三项工作：一、主动地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谬论，揭露他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寇，及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对进步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围剿的卖国反共罪行。二、培养青年一代。三、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社会活动。耕心同志因处境特殊，让我主要去抓一、三两项工作。

耕心同志从到阿城县立三高开始，就重视教育培养新一代。为了自编教材，他把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杂志都订到了。为了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并准备大伙集股，由杨鼎同志负责，在阿城成立一个晨光书店。筹备半年，因书的来源和销售都有问题，就作罢了。

一九三三年的冬假，韩子栋同志回家，主动向耕心同志和我提出，由他代为我俩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北方局去，作为单线领导关系。不久，北方局通过韩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要他到苏区党校学习，因耕心同志那时脚疾严重，没有去成。不久，韩子栋同志在北平被捕，直到一九四七年夏，才从重庆监狱逃出来。（据说小说《红岩》中华子良就是以韩子栋为原型塑造的。）

一九三四年秋，以耕心同志为首，另有盛北光、申云浦、翟子超（鱼台

人)等同志和我,倡导发起组成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在安乐镇县立二高一次会议上宣告成立。为了大力发展“中坚社”,耕心同志介绍与他一块任教的王伯谨同志加入了共产党,没过几天,他即偕同王伯谨同志到寿张省立第八乡师和党支部书记王福昌同志取得了联系。不久,盛北光、翟子超、申云浦等同志都先后离开了阳谷,对“中坚社”的领导只有耕心同志一人负责了。

一九三五年春,耕心同志调到安乐镇县立二高任六年级班主任。当年秋,我被国民党反动派从县民众教育馆撵出(由武子升同志为力,我曾担任民众教育馆讲演部主任一年多),又有耕心同志为力,把我安排在安乐镇县立二高和他一块当教员了。我作为他的助手,仍担任原来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冬,宋励华同志也返回了家乡,从此,耕心同志又添了一位抓会道门工作的助手。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我和耕心同志才同时离开了安乐镇县立二高。

耕心同志为培养青年一代呕心沥血,经两年多的努力,把二高变成了培养革命战士的红色小学。从一九三五年春天起,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安乐镇县立二高的毕业生和一二年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革命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为在国民党二十六军孙连仲部开展策反工作,将其改造成抗日武装,杨耕心受鲁西特委的派遣,他发动了百余名进步青年抵达孙部。由于叛徒出卖,策反工作随告失败。耕心同志辗转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党留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军运工作,因此他在西安打入胡宗南办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学习,后被分配到国民党暂编三十六师任简报主任,由于他和该师领导人的政见不同,曾两次遭敌禁闭。

一九四三年秋,在鄂西大会战中被俘,惨遭日寇杀害,终年四十三岁。杨耕心同志是阳谷县党的奠基人和革命的先驱之一,他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求解放的一生。

宋占一烈士

宋占一同志,字子贯,后改为魁甫。山东省聊城市西南小张庄人。一九〇七年九月四日生于一个中农家庭里。父亲宋茂斋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农村小学教师。占一自幼跟随父亲读书,九岁丧父,在其母张氏抚育下和胞兄魁一、妹妹香莲共同生活。

占一童年时代曾在本村读过一段私塾，不久考入邻村小学念书，一九二〇年考入聊城东临道模范小学二年级插班。时在学校有个演讲会的组织，利用星期六晚，自行选题轮流讲演，以启发学生思想，锻炼学生口才为目的，他被推选为会长，常以“爱国”二字命题，来启发激励同学。占一学习非常刻苦，即使假日也手不释卷。在寒假暑假期间，哪怕冰天雪地，烈日当头，也是经常在他家后园子里一棵皂角树下，独自一人苦钻苦学。一九二二年冬小学毕业后，因生活困难，遂辍学，任本村小学教师半年。由于舅父资助于一九二三年秋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习，开始学白话文，因而逐渐接受“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因学习努力，成绩优异，在同学们中间威信很高。“五卅”惨案发生后，聊城三师和二中学生纷纷起来抗议和示威游行。宋占一站在斗争前列，并组织“爱国十人团”，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以后，宋占一协同由黄埔军校回来的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孙大安等在聊城点燃起新的革命火焰。

一九二七年春天，宋占一由三师学生党员张廷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在聊城建立中共鲁西县委时，被补选为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著名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起义爆发时，宋占一同志亲自参加了起义军的组织和领导，并参与了革命文告的起草工作。二月七日起义失败后，他由冠县回聊城，路经他外祖母家贾庄时，隐蔽数日，后潜入城内古楼东福庆恒杂货店（该店系宋幼年至交向俊如开设），因外面风声紧急，不容久停，乃于三月间化装成商人模样逃往济南，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后任团省委秘书长、团省委书记。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军机关迁往泰安。十二月间党内出现了叛徒王复元、王天生，二王投靠国民党，组织捕共队，使我山东党组织遭受破坏。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起，十日内，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六处、团山东省委三处被破坏。邓恩铭、刘谦初、朱霄、纪子瑞、刘一梦、宋占一等主要领导同志被捕，关押在济南普利门外山东省第一监狱。

宋占一在狱中屡受拷打，坚贞不屈，他和被捕的同志互相支持，互相关怀，为了改善待遇，他参加了以邓恩铭同志为首的狱中绝食斗争，并获得了胜利。一九三〇年九月军阀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山东省第一监狱的共产党员又组织了第二次越狱斗争，七人逃出监狱，邓恩铭、宋占一等十一名同志，重